

#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

## 第一章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诞生和成长

###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军事问题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建立，是近代中国社会变化和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不断侵略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则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造成了近代中国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从鸦片战争到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革命处于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期间，中国人民进行过无数次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运动。这些斗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清朝的封建统治，使他们灭亡中国的阴谋不能实现，表现了中国人民为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祖国富强而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但是，这些斗争都失败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历史表明，在中国，无论是农民战争或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都不能彻底解决中国的社会矛盾，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历史地落到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党的创立奠定了阶级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开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以后，1922 年 7 月，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党首先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从 1922 年 1 月至 1923 年 2 月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武装镇压下，1923 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在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得到了血的教训：如果没有强大的同盟军和革命武装力量，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从此，党采取积极步骤，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组织革命统一战线，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战争。1923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以党内合作形式，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孙中山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

1924 年，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明确提

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在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出现了大革命的新局面。这是一场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压迫，推翻封建主义和军阀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它以战争为主要形式，史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参加组织军队、进行革命战争的早期实践。

这场革命经历了创建广东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两个阶段。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两党合作，于1924年和1925年，创办了黄埔军校和创建新制度的军队，联合其他的军队，扫荡了广东的反革命势力，建立了广州国民政府，统编了国民革命军，击退了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发动了广东工农运动，举行了省港大罢工配合上海工人五卅运动，使广东成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和策源地。

1926年6月，广州国民政府出兵北伐，向北洋军阀发起强大的进攻；工农民众运动也由南向北迅猛发展，冲击着买办豪绅阶级的统治基础，有力地支援北伐军作战。到1927年3月，北伐军已先后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的全部和江苏、安徽的一部，打败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两个集团，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一个光明的中国有望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

但是，就在革命胜利发展的同时，国民党内部的反革命势力也在迅速增长。

1925年3月，孙中山过早地逝世了；8月，坚持执行孙中山革命思想和政策的廖仲恺也被国民党右派刺杀，代之而起的蒋介石和汪精卫，本质上是军阀和政客，在国民党尚未成气候时，他们虚伪地赞同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合作关系，支持工农运动；而当着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时，他们已分别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了反革命集团，各自控制和依附的一部分军队，毫不踌躇地将革命力量打入血泊之中，相继于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公开叛变革命，背叛孙中山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篡夺了革命和战争的胜利果实。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上都还没有经验，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懂得不多。从这一时期的中期开始，党已处在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诡计的包围之中，但没有警惕；这一时期的后期，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实行右倾机会主义，主动放弃对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军权，当着国民党反革命派突然袭击时，采取妥协投降政策，不能组织党和人民进行有力的反抗，这就导致了革命无可挽回的失败。

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实践，中国共产党已对军事问题作了初步的探索。这种探讨和实践，在客观上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党独立领导人民创建军队和开展革命战争作了必要的准备。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中国大革命，“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

---

全称“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因设在广州黄埔港附近的长洲岛上，故简称黄埔军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1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与国民党合作建立新制度的军队

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实践的主要内容，是与国民党合作建立新制度的军队。黄埔军校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活动的“开端。1921年共产国际派代表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派出的张大雷陪同下，到桂林与孙中山进行了秘密会晤，期间提出了建立军校的建议，得到了孙中山的赞同。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蒋介石、张太雷等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政治和军事。

1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建立“国民军军官学校”的决定。国民党“一大”以后，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由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和参与下，孙中山加快了建立军校的步伐。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创立。孙中山认为，创办军官学校，就是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革命军应以“救国救民”为宗旨，“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为保证革命军成为党军和有革命的精神，他决定汲取苏俄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实行政治工作制度。

这时，国民党内具体负责建军工作的是廖仲恺和蒋介石。廖仲恺的主要工作在政府；蒋介石热衷于沿袭军队的私有制和雇佣军制度，以便控制军权。

这样，依照苏俄红军建设的经验，开展军队政治工作的重任，便落到了共产党人的身上。

### （一）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部队中建立特别党部、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

依据中国特点，并参照苏俄红军的经验，黄埔军校和革命军建立了国民党特别党部、党代表和政治部的制度。共产党人参与设置并着重负责贯彻这些制度。

特别党部制度先在黄埔军校实行，后推广到国民革命军其他一些部队。它规定凡国民革命军官兵皆为国民党党员，皆应受国民党的组织和纪律的约束，完全接受党的训练、指示、管辖和制裁。这个制度自成垂直系统，各级党部设执行和监察两个委员会，履行职责，其总体职能在于保证军队“党化”，使军队成为有“铁的组织、钢的纪律”的党军。

党代表制度摹仿苏俄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先在黄埔军校实行，后国民革命军的军一级也普遍实行。它代表国民党监督同级军事长官行使军权，规定凡呈请、命令、通告和指挥事宜，均须党代表副署才有效。

政治部制度先在黄埔军校实行，后在国民党革命军师以上各级实行，为司令部下属单位，与参谋部（处）并行，受同级党代表指导，对内负责官兵的政治训练，对外宣传、发动民众。团一级设政治指导员，履行政治部职能。

这三个制度，特别是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1924年到1927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

---

孙中山：《陆军军官学校开学演说》，1924年6月16日。

孙中山：《北上宣言》，1924年11月10日。

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

## （二）承担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绝大部分政治工作

黄埔军校建立半年内，国民党中央曾先后任命两任政治部主任，但均不久去职，故这期间的黄埔军校，名有政治部，实无主任，更无机关和工作。1924年11月，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不久升任主任。他上任后立即建立机关，开展工作。从此到1926年，黄埔军校政治部基本由共产党人负责。先后担任主任和副主任的还有熊雄、鲁易。期间，聂荣臻、杨其纲、洪剑雄等，先后在政治部机关工作。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学工作和特别党部也基本由共产党人担负。恽代英、高语罕等先后担任政治主任教官，萧楚女等任政治顾问和政治教官。金佛庄、周逸群、蒋先云等10余人先后当选为校特别党部第一至第四届执行委员或监察委员。到1926年6月，在校供职的共产党员已达160多人。

1924年10月，国民党组建党军教导第1团时，共产党员胡公冕出任营党代表，许继慎、黄鳌、张际春、曹渊等9人分任连党代表。翌年8月，党军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周恩来任军政治部主任兼第1师党代表，后升任该军副党代表；鲁易任第3师党代表；蒋先云（后在北伐时牺牲）、严风仪、王逸常等7人分任其中7个团的党代表。此外，还有许多共产党员在军、师政治部工作，或在团任政治指导员，在营连任党代表。到1926年3月，在第1军工作且身份公开的共产党员有250多人。

10月，中共中央统计全党人数时，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的党员已占全党党员数的8.5%，达1500多人。这些党员的绝大部分在各级做政治工作。

从1926年春到1927年初夏，在国民革命军担任军级政治工作职务的共产党员还有：任第2军副党代表的李富春；任第3军副党代表的朱克靖；任第4军副党代表的罗汉；任第6军副党代表的林祖涵（林伯渠）；任第7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黄日葵；任第8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彭泽湘等。当时，各军并不完全实行政治工作制度，故凡实行这个制度的部队，其政工干部的绝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当时的各军党代表，皆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兼任，副党代表是实际上的党代表。周恩来曾经说过，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几乎全由共产党人担负。

## （三）培养官兵“一心一意为国家奋斗”的革命精神

孙中山在确定建军原则时，曾一再强调革命军的官兵要有“不要身家生命，一心一意为国家奋斗”的革命精神。这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基本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政治工作时，努力对官兵进行思想教育，使之树立“一心一意为国家奋斗”的革命精神。

周恩来主持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后，制定了政治训练计划，通过举办政治讨论会、出刊物、办墙报、教唱革命歌曲等多种形式，使军校内形成浓烈的进步政治空气和民主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1925年的两次东征，他除了抓战斗各阶段的政治动员外，着重组织了政治宣传队，开展对革命军和民众以及对敌军的宣传，并且建立“血花剧社”随军开展慰问和宣传活动。政治工作的效果在东征中得到了检验。蒋先云在他的《由前敌归来》的报道中曾这样写道：“当营连党代表、当下级干部的

---

《毛泽东选集》，第2卷，380页。（本书以下只注卷和页）

孙中山：《陆军军官学校开学演说》，1924年6月16日。

都是我们的同学。打淡水城时，同学身先士卒，扒城先登，不知道什么生死”，“这种精神，亦就是平日主义训练的结晶”。政治部宣传队也被官兵誉为“伟大的宣传队”。

这种精神，是革命军的灵魂，是革命军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这种精神，就产生了主动的、富于攻击精神的作战，有了东征和北伐的胜利。

（四）建立和发展叶挺独立团，培养了一批共产党的早期军事骨干

1924年10月，中共广东区委从平定广州“商团军”动乱的斗争中，认识到有必要为统帅部建立一支机动分队。在孙中山的支持下，组建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1925年11月，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在征得国民革命第4军军长李济琛的同意后，由黄埔军校抽调干部，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34团（次年改称独立团），原铁甲车队编为该团1个营，叶挺任团长。该团建立了共产党支部，著名的共产党员除叶挺外还有参谋长周士第，营长曹渊（后在北伐中牺牲），许继慎，参谋董仲明（董朗），连长卢德铭等。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直接掌握的武装。这支部队政治素质好，军纪严明，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1926年5月，它作为北伐军先遣队、尖刀团，率先由广东出发，首战碌田，长驱泗汾、醴陵、平江，血战汀泗桥，直捣武昌城，所向披靡，令敌军闻风丧胆，令友军赞叹不已，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北伐部队获得“铁军”殊荣作出了主要的贡献。

1927年春，叶挺升任为扩编的第11军第24师师长（后晋升为第11军副军长兼第24师师长），带走独立团的一批干部充任该师3个团的骨干：独立团大部编为第4军第25师第73团，一部编入第75团，此后，第73团又调出一批骨干组建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卢德铭任团长。该团担任位于武昌的国民政府警卫任务，故又称武昌警卫团。

1926年1月，国民党中央决定把黄埔军校改成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同年冬在武汉创办分校，1927年3月，武汉分校改为主校。期间，共产党员恽代英任政治主任教官，郭沫若、周恩来、李富春、李达、蔡畅等先后兼任武汉军校政治教官，陈毅做学员队政治工作。武汉军校师生近4000人，学员队相当于1个团，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建立的又一支部队。

在参加创办黄埔军校和武汉军校的时候，为保证学员的政治素质，每当招生，中共中央都指示各地组织动员党、团员和优秀青年报考军校。这既为国民革命军输送了一批优秀的军官，事实上也培养了共产党早期的一批军事骨干。

（五）给稍后编入国民革命军的一些部队以民主的政治训练

1926年7月，湘西地方部队贺龙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要求总政治部派政工干部到所部开展政治训练。中共湖南区委受总政治部委托，派周逸群率政工干部30人前往贺部工作，对部队政治素质的提高起了明显的作用。

1927年2月和6月，贺部编为独立第15师后扩编为第20军。周逸群在部队建立政治部，并发展共产党组织，贺龙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后，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坚定地站在革命力量一边。

1926年7月，共产党员段德昌到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1师任政治部秘书

---

《中国军人》，第2号，1925年3月20日出版。

《东征记略》，《政治周报》第2期，1925年12月20日。

长，后升任主任，与该部第1团第1营首长彭德怀来往密切，促使该团首先建立士兵委员会，维护士兵民主权利。后来，彭德怀升任第1团团团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该团建立共产党组织。

其间，共产党员朱德、刘伯承在四川军阀部队中开展国民革命宣传，影响川军的部分将领率部在泸州、顺庆兵变，组成国民革命军第15军，刘伯承任军长。这个军不久失败，但这次兵变给川军以一定的触动。此后，刘伯承到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朱德到第3军任军官教导团团长，又给所部以革命影响。国民革命军高级军官叶剑英，也在这一时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并于武汉国民党当局公开叛变革命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

应当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上述努力，在总体上是按照陈独秀领导的党中央只负责做政治工作不掌握军权的指导思想进行的。孙中山逝世以后，掌握着军权的蒋介石和各军将领，逐步背离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沿袭旧军队的私有制和雇佣制，反对在部队中开展革命的政治工作或者只在所部形式主义地开展政治工作，把共产党人的政治工作划定在为他们巩固部队和提高战斗力的范围内，完全服从他们的需要。当他们不再需要时，便毫不留情地把共产党人赶出军队，甚至惨无人道地对共产党人实行屠杀政策。所以，尽管共产党人在一部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民革命军的雇佣军队的性质。一旦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他们所掌握的军队即沦为新军阀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镇压中国革命的工具。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它说明无产阶级政党不掌握军权，就不可能建立和建设起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努力，对后来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它使党得到了深刻的教训，认识到掌握军权的极端重要性，开始创建一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二是有了军队建设的初步经验，为后来人民军队建设奠定了基础。三是在国民革命军的官兵及黄埔军校的师生中，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同时，还直接掌握了少量部队。后来，在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等重大武装起义中，党所影响和掌握的部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培养的党的早期军事骨干，如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陈毅、林彪、朱云卿、左权、萧劲光、粟裕、黄鳌、周逸群、徐向前、许继慎、曾中生、陈赓等，后来都成了红军的著名将领。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在直接准备和组织军队的问题上，“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朱德也说过：“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党的军委当时也曾选派干部到黄埔军校学习，好些人后来成了红军的骨干。”

## 广泛动员民众，建立工农自卫军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动员和组织工农民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运动，支持援助革命战争，作为工作重心。在此期间，

---

《毛泽东选集》，第2卷，547页。

朱德：《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的讲话》，见《朱德选集》，1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党还十分重视建立工农民众武装，使工农运动和武装斗争密切结合起来。

这个工作首先从广东开始。通过召开农民和工人代表大会造声势，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和训练农民运动干部，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等措施，迅速打开局面，并由南向北发展。1925年5月，上海工人发动五卅运动，广东工人立即发动省港大罢工以响应和声援，使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买办阶级压迫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中国大革命开始进入高潮。

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民众“请求广州国民政府出兵北伐”。继而，中共中央在党内进行北伐的动员，提出“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要求全党“从各个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组织发动民众，特别是组织发动北伐必经的湖南、湖北和河南等省农民，以接应北伐。3月，中国共产党发表通告，号召全国民众，“集中于广州国民政府革命旗帜之下，助成他的北伐使命”；并且指出，民众不可坐待北伐军来解放自己，“应立即起来团结，武装和革命”，求得自身的解放。北伐战争开始后，湖南和湖北农民运动兴起。为了将全国农民运动引向深入发展，中共中央于11月任命毛泽东为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制定了全国农民运动发展计划。这个计划是全国农民运动发展的蓝图，它提出以集中为原则，就全国而言，要求除广东省以外，应集中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4省发展；各省也应贯彻集中原则，湖南着重是湘南、湘中和湘东北等地区，湖北着重是京汉铁路两侧和长江两岸地区，江西着重在吉安经南昌至九江一线，河南着重在京汉路沿线等地区，福建着重在闽西，广西着重在右江地区，等等。此后，全国农民运动基本按这个蓝图发展，特别是两湖的农民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组织起来的农民，向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和封建宗法思想与制度发起冲击，造成空前广大的农村大革命。农民运动的兴起又促进工人运动的发展。至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前，全国工会会员已发展到280多万人，农民协会会员则发展到近1000万人。

为了适应工农运动的开展和支援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起来的工农民众建立自卫武装。首先，在广州建立“工团军”（即工人赤卫队）和农民自卫军，到1927年3月，全省的工农自卫军已达约1万人。继而，湖南和湖北也相继建立工农自卫军，到1927年6月武汉国民党当局叛变革命前，两省农民自卫军已分别发展到拥有3000枝和2000枝枪，武汉工人纠察队已超过2000人。有些地区的工农自卫军已发展为正规军，如海陆丰地区已组成400多人枪的工农自卫军常备队；湖南平江、浏阳两县，则组织了实力相当于正规军1个团的工农义勇队。

工农运动的发展得势于革命战争的胜利，革命战争则得到了组织起来的工农群众的支持和援助而胜利发展。第一次东征时，海陆丰农民自卫军主动夺取县城，迎接和支援东征军；当着北伐军由广东进入湖南时，广东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了数千人的输送队，将北伐军的辎重送到湘南；当北伐军转战于湖南、湖北、江西时，又有数万工农群众支援乃至直接参加了粤汉铁路两侧和赣江两岸至南浔路的历次战斗；当北伐军挺进浙苏皖时，又有湘鄂赣3省工农给以人力物力的保障，上海工人则发动武装起义策应北伐军的胜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一九二六），40、81、88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一九二六），40、81、88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一九二六），40、81、88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利进军。

当着工农民众运动蓬勃发展，推动北伐战争胜利前进时，蒋介石、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集团相继背叛革命，对工农运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然而，革命已深入人心，镇压只能引起反抗。后来，中国共产党被迫独立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各地的工农武装起义绝大部分发生在大革命时期工农民众斗争开展得比较广泛的地区，而红军的一部分，也来自于这一时期建立的工农民众武装。

### 在实践中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段时间里，还处在幼年时期，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懂得不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错误，以至于对军队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走过一个曲折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学说和十月革命的经验，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明确规定：“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1922年，周恩来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中指出：“真正的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蔡和森也指出，党专做工人运动是不够的。如果能用一部分力量去做军事工作，“鼓起人民武装的自卫和抵抗，使各大城市的市民全副武装或工人全副武装，那么，民主革命没有不成功，封建的武人政治，没有不崩倒的。”1923年11月至1924年1月，邓中夏接连提出，工人、农民、兵士是“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军阀所恃者唯兵，打倒军阀的最有效方法是兵士运动。”恽代英写道：“革命是不能绝对脱离武力战斗的手段的”。这些认识，虽然还是初步的、概念的，基本上还处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上，但也表现出党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看到武装群众和开展兵士运动的重要性。随着与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和进行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人对军事重要性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在逐步提高。1925年，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中指出：近年来中国社会变化，已经造成武装斗争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其他方式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做革命战争的准备；军队是革命的极端紧要问题，“政治上以革命民众的政党为主体，军事上以正式的革命军队为主体，从事于革命的作战……而后中国平民才有彻底解放的希望”。同时，周恩来也提出，“军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为被压迫阶级的工具”。毛泽东在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

---

蔡和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见《六大以前》，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邓中夏：《论兵士运动》，见《六大以前》，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恽代英：《何谓国民革命》，见《六大以前》，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瞿秋白选集》，2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刊七），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

立农民武装。

中共中央对军事工作也开始重视。192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四届二中扩大会议决定建立中央军事部，指导党的军事工作。1926年7月，中共中央四届三中扩大会议又专门作出《军事运动议决案》，指出“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

然而，在这一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特别是武装斗争问题上，指导思想存在着严重错误。当时党的主要领导者认为，中国革命应当分为两次：第一次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帮助资产阶级实现民主革命，从中得到一定的经济解放和合法斗争的政治权利；然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通过长期合法斗争，团结、争取广大群众和一部分士兵，在适当时机实行城市武装起义，一举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国家政权，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即第二次革命。这就是所谓的“二次革命论”。

这种理论，使党在军事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错误的认识和观念。依据这个理论，党在第一次革命中，仅处在帮助资产阶级的消极地位，不需要也不应当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党不掌握革命领导权，更不需要掌握军权；依据这个理论，党在第二次革命时，也不是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而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后，以城市武装起义一举夺取政权，然后建立国防军保持政权。这样，得出的必然结论就是：党不论是在第一次革命还是在第二次革命，工作中心都是发动和争取群众。党虽然已从当时的革命实际需要中，提出了建立“联合战线”进行“联合战争”的正确主张，但又仅停留在帮助国民党组织军队和进行革命战争的范围内，并没有直接组织自己的军队。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军权都被放弃了。这种错误的理论在1927年春开始得到纠正，但也仅仅是从理论上认识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并没有解决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取问题，更没有解决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问题。

1927年4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共两党合作关系开始由局部破裂向全面破裂发展。形势的急剧变化，促使中国共产党加深了对独立自主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军队重要性的认识。5月13日，国民党军夏斗寅独立第14师叛变，企图进攻武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蔡和森和李立三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以党所掌握的叶挺部队和武汉军校的学员队占领粤汉路，镇压夏斗寅叛军；如果唐生智的部队也叛变。党所掌握的部队则由粤汉路取湖南为根据地，再进攻湖北和广东；并且提议，“积极准备武力，以暴动对付暴动”。

6月上旬，国民党所谓“二期北伐”的河南战争结束，各方代表在郑州会晤，国民党彻底反共的趋势已十分明朗。蔡和森提出的“以暴动对付暴动”的政策，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数人所赞同。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军事部积极作出安排，调集军事干部赴湖南和江西，准备组织工农暴动。但是，总书记陈独秀实行对国民党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党的方针没能立即改变。

6月底，武汉国民党当局派何键第35军进驻武昌，同时发布解散工农革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一九二六），229页、22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508页。

命组织的训令。中共中央迫于何键的压力，下令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7月4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湖南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党应注意保存农民武装，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并且指出，农民武装应“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陈独秀虽然赞成“使农民武装化”，但仍认为应当采取联合唐生智对付何键的政策，没有认清武汉国民党当局反共的一致性。

7月15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当局作出“分共”决定，公然步蒋介石集团的后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实行大屠杀。至此，国共合作关系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归于失败。

血的教训，终于使共产党人认识到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中共中央指出，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创造新的革命军队，不要有雇佣的性质，而要开始于志愿兵的征调，渐进于义务的征兵制，建立工农的革命军”。

---

《毛泽东年谱》，上卷，2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340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二、武装起义，人民军队的诞生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发生重大逆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篡夺革命胜利果实所建立的反动统治，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它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人民。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在大约一年间，共产党员被杀达 2.6 万多人，革命人民被杀近 30 万人，还有许多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积极分子被捕，一些同志不得已暂时避难藏匿。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消极了，甚至叛变了。共产党员的数量由近 6 万多人锐减至 1 万多人，工农会员只剩下 10 多万人，农民协会全被取缔了，工农自卫军的绝大部分被缴械、解散。几十个月前还是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了。

与此同时，革命的阶级阵营也发生分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右翼，被继续打着孙中山国民革命旗号的国民党反动派所述惑，继续跟着国民党，实际上是倒向买办豪绅阶级的一边。

革命最直接的敌人，已不仅是旧军阀，更主要的是国民党新军阀。它拥有国家政权和庞大的军队，有着买办豪绅阶级的社会基础，得到了世界上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和援助。

显然，中国革命处在极端危险的困难时期。

但是，这并不等于革命没有重新兴起的可能。国民党政权的建立，并没有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它的统治，不过是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外勾结帝国主义，继续出卖国家的利益；对内代表买办豪绅阶级，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人民。因而，引起革命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更加的尖锐。国民党与旧军阀的争夺并没有完结，它的内部陷入分赃火并与“削藩”和反“削藩”的战争，帝国主义和买办豪绅阶级支持下的军阀混战，仍然是中国的特征之一。这种社会局面，给革命复兴造成了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虽然遭到很大的破坏，但中央和省市一级的领导机关基本保存下来了，而基层组织也在努力恢复之中，中国革命仍然有着领导的核心力量。党通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军事问题上的探索和实践，通过对工农运动的领导，已经在客观上为创建人民军队、开展革命战争，作了必要的骨干准备和群众动员。特别重要的是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已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军队和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决心领导人民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所有这一切，都为中国革命的重新兴起提供了可能。

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在会上，毛泽东强调指出：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起义作为党当前的重要任务。

蒋介石、汪精卫自以为屠杀可以吓倒、征服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彻底镇压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屠杀的结果，是

---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 卷，2 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本书以下只注卷和页）

迫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拿起枪杆子，作殊死的斗争。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被国民党反动派“逼上梁山”的。

## 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开始领导人民创建自己的军队，进行革命战争。光辉的8月1日，成了人民军队建军的纪念日。

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力首的武汉国民党当局作出两项重大决策：一是公开宣布“分共”，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采取“宁可枉杀千人，也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屠杀政策；二是发兵“东征讨蒋”，与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蒋介石集团，争夺国民党正统地位和长江下游地区。这时、武汉国民党当局所属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不愿为汪精卫等人的利益去与蒋介石集团拼命，企图借所部“东征”行动之机，在兵进江西时折转南下，回广东另立局面。对于“分共”，张发奎考虑到他的第二方面军的第24、第25师为共产党人叶挺所领导，第20军军长贺龙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为稳定军心实现南下企图，他不能也不敢断然立即“分共”。

7月中旬，中共中央采取非常措施，以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5人，组成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停止陈独秀的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组成后，作出两项应变决策：一是发动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4省农民秋收起义，夺取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二是将武昌警卫团、武汉军校学员队和平浏工农义勇队等武装力量集中到第二方面军，和该方面军的第24、第25师一起，随张发奎回广东，徐图发展；并决定将党中央的部分领导和机关干部，疏散到第二方面军的势力范围九江地区，以避免损失和加强对党掌握的部队的领导。不日，中央发现汪精卫在极力拉拢张发奎，遂又给九江的同志以张发奎如跟汪精卫走我部则与他脱离关系的指示。

7月20日，在九江的中共中央委员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与叶挺、聂荣臻一起分析形势时，认为张发奎已靠不住，必须实行脱离关系的原则，联合贺龙第20军在南昌起义，打出“左派国民党”旗帜，自成局面，坚持革命。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个计划，并派周恩来到部队组织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直接领导这次起义。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并取得成功。接着，组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原第4军第25师并入第11军，第20军开始组建第3师，另设第9军番号（后建立约1个营的部队）。贺龙军长代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升任第11军军长并代理前敌总指挥，朱德任第9军副军长，刘伯承任革命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中共党员聂荣臻、廖乾吾、朱克靖分别任3个军的党代表。全军共2.3万人。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起点。它似春雷，报道革命的严冬即将过去，春天就要来临；它是旗帜，在革命失败的形势下给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指明了武装斗争的方向。它标志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始。

南昌起义后，由于缺乏经验，部队没有与江西农民运动结合开展斗争，而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既定战略，离开南昌，南下广东。南昌起义前，中共中

中央在批准起义计划时，曾要求前委在起义成功后，率部南下广东东江地区，控制海口，争取得到共产国际的物质援助，会同东江地区工农民众的势力，夺取广州，重建广东根据地，再行北伐。中央的这个战略规定显然是“依张回粤，徐图发展”决策的具体化。但原定“依张回粤”的力量是整个第二方面军的近5万兵力，它足以与总兵力虽有5万多人，但嫡系部队只有3万多人的国民党李济第8路军一争广东；可是南昌起义军仅仅是从第二方面军分化出来的、还不够巩固的2万人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再南下广东，就不可避免地使起义军陷入与优势广东国民党军决战的危险境地。

8月下旬，起义军与前出赣南拦阻的广东国民党军进行了第一次决战。经过壬田、瑞金、会昌等多次血战，共歼敌6000多人，但此时自己已损失半数。9月底至10月初，起义军主力又分别在广东揭阳北面的白石和大埔的三河坝等地，再次与敌决战。虽给敌以重大打击，但终因敌众我寡和消耗严重而无力再战。实践证明，南下广东再次北伐的道路行不通。

主力失败后，一部由董朗率领，退入农民运动发展的海陆丰地区，后编为工农革命军第2师，与当地农民相结合在海陆丰坚持斗争。另一部由朱德、陈毅率领，退出广东，进入赣西南。在崇上堡对剩下的800多人加以整训后，部队又经粤北于1928年1月进入湘南，占领宜章，发展到2000多人，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这支部队后来转战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成为红军的重要来源之一。

##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中共中央在批准南昌起义后，将南昌起义和湘鄂粤赣4省农民起义作为一个斗争整体考虑，并希望夺取广东和湖南两省政权。故在南昌起义爆发的第3天，中共中央颁布了湘鄂粤赣4省农民秋收起义大纲，将原已拟定的秋收起义计划，提交湘鄂粤赣4省各级党组织实行。大纲体现了4省农民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相互配合和策应关系。在对湖南任务的规定中，任命毛泽东为中共湘南特别委员会书记，要求特委领导湘南农民起义，建立革命政权，受广东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与广东的革命斗争相呼应。

毛泽东受命湘南特委书记后，认为农民起义必须以正规军为骨干。他即向中央提出，请中央将平浏工农义勇队调到湘南，并请南昌起义前委派1至2个团的部队到湘南，组成为1个师，以便占据四五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形成为湖南武装斗争的起点。并且提出设想，如果湘南的斗争失败，部队不应调往广东，而应“上山”。

8月中旬，毛泽东到长沙，与中共湖南省委讨论湖南秋收起义计划。认为中央拟定的湘南起义计划，因没有落实所需的正规军，必须暂缓执行。他还进一步提出，国民党的旗帜已成为白色恐怖之象征，必须抛弃，应以党的旗帜领导人民革命；应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调动农民的革命热忱。他的这些战略、策略性意见，得到了与会的多数同志的赞同，也左右了湖南秋收起义计划的制定。8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从安源党组织的报告中得悉，原定参加南昌起义的武昌警卫团和平浏工农义勇队没有赶上起义，退驻在赣西北修水、铜鼓地区；同时，罗荣桓从鄂南带来的一部农军在修水，王兴亚从赣西带来的一部分农军在安源。据此，省委决定，由毛泽东任省委前敌委

员会书记，到湘赣边界将上述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并率其会攻长沙；由易礼容任省委行动委员会书记，发动长沙周围 7 县镇农民起义，配合工农革命军夺取长沙。

9 月初，毛泽东到达安源和铜鼓，向当地和部队的共产党组织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计划，将上述各部分编为 3 个团，组成工农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原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为总指挥，副团长余洒渡为师长，这支由工农兵组成的部队约 5000 人；以各部长官为委员组成前敌委员会，并与各部领导协商制定了向长沙攻击前进的作战计划。

9 月 11 日，工农革命军各团按预定的计划起义。由于部队分散行动，加上一些领导者麻痹轻敌，致使进攻失利。北路第 1 团遭敌袭击损失 200 多人，南路第 2 团改攻浏阳城后在敌反攻下溃散，毛泽东所在的中路第 3 团也在浏阳东门市地区被敌阻挡，难于前进。更加严重的是行委领导的 7 县镇农民起义，由于准备仓促没有能形成足以牵制敌军的大规模起义局面，预定的进攻长沙计划已不能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当机立断，命令各部停止前进，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 月 19 日夜，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师长余洒渡等人坚持继续向长沙前进，以攻占长沙。毛泽东则力主保存实力，放弃攻占长沙计划，部队转而沿罗霄山脉南下，到远离敌人中心城市且农民运动基础好的湘南寻求发展。总指挥卢德铭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前委作出放弃攻长沙计划部队南下湘南的决定。20 日晨，部队由文家市出发，开始南下，后又几经挫折，最终确定向井冈山进军。这支部队成为红军的又一重要来源。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继南昌起义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它的特点在于不仅仅是军队的行动，而且有众多的工农武装参加；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旗帜，号召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在指导上更从实际出发。这次起义，虽然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武装斗争的一个局部，但这个局部在策略和战略方面所把握的基本点，却有全局的指导意义。那就是：必须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领导中国人民武装斗争；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以调动农民的革命热忱；必须首先建立军队，以军队为农民武装斗争的骨干；必须由敌人力量强大的城市退却，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必须有“上山”的准备，“上山”可以造成革命势力的基础。也正因为是这样，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放弃进攻中心城市转向农村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武装革命胜利的伟大起点。

## 广州起义

1927 年 12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举行广州起义。这次起义与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一起，构成了有代表意义的三大起义。

国民党新军阀在篡夺中国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后，立即陷入了内部的分赃火并。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联合起来，向蒋介石争权夺利。蒋介石一时失势，遂以退为进，宣布下野，将“宁汉对立”的矛盾推给李宗仁去解决；另一方面，又多方活动，寻求日本和美国的支持，以求东山再起。李宗仁决心用战争来解决“宁汉对立”的矛盾，于 1927 年 10 月打出“西征”旗号，“讨伐”唐生智，湖南、湖北战火又起。张发奎率领第二方面军余部回到广东后，又与李济琛兵戎相见、争夺广东。

国民党新军阀战争的爆发，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革命造成了有利时机。鉴于9、10月份各地举行的秋收起义均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中共中央于11月上旬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利用有利时机，全党动员，再次发动武装起义，以夺取国民党在广东和两湖的政权，并动摇其在北方的军阀统治。这次会议在继续贯彻八七会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上是正确的，但也存在着将党的武装斗争全面引向城市，以城市为中心的错误。

广州起义，是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进行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这次起义的主力仍是军队。7月底，武汉军校的学员队奉中共中央指示离开武汉，准备开赴南昌参加起义，但部队到达黄石港时，南昌起义已爆发，学员队被张发奎部截住，陈毅等身份公开的共产党员被迫离队。同时，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的秘密共产党员叶剑英，为保存党的这支队伍，说服急于扩军的张发奎，将其收编为第4军教导团，叶剑英亲自兼任团长。此后，该团随第二方面军余部南下广东，进驻广州市。张发奎回广东后，又组建第4军警卫团，部分共产党员打入该团，基本控制了局面。这2个团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

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把工人作为这次起义的重要力量，并对起义作了比较周密的准备。张发奎回广东后，将主要精力放在与李济争夺广东上，为稳定社会秩序，他没有采取新的白色恐怖措施，广州的工会组织乘机恢复。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接到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精神后，加紧起义的准备，着力于组织广州工人赤卫队。

11月中旬，张发奎与李济争夺广东的矛盾发展为军事行动。张发奎将主力部队调往西江等地，准备对李济部队作战，广州只剩下教导团、警卫团和少量留守部队。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以省委书记张太雷为委员长的起义领导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以叶挺为总指挥、叶剑英为副总指挥的起义军总指挥部。

12月11日深夜，广州起义爆发。起义部队很快控制了市区，以苏兆征为主席的广州市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

当时的计划是起义军坚守住市区，待位于粤北的朱德部队和位于海陆丰的董朗部队到达广州后，对敌发起进攻，夺取广东政权。熟悉张发奎部队情况并富有作战经验的叶挺等人，认为这个计划不切实际，建议起义军撤出市区，避免与敌拼消耗。但省委坚持执行中央的夺取广州指示，拒绝采纳这个建议。

12日，国民党军以3个师的兵力，在美英日法等帝国主义军舰和海军陆战队的支援下，从南、西、北3个方向向广州发起反攻，起义军与敌展开激战，损失严重，张太雷壮烈牺牲。

13日，起义军被迫撤出市区。

200多人向北突围，撤到北江，后由朱德部收编，最终带上井冈山；主力1000余人撤到花县，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叶镛任师长，袁裕（袁国平）任党代表，后于1928年1月转移到海陆丰，参加当地的武装斗争。

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向反革命势力进行的一次英勇反击，是以工人和军队的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一次大胆尝试。起义后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当时被誉为东方的巴黎公社。广州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是党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引起中共中央的进一步思考，开始认识到首先夺取中心城市的道